

中国社会学知识生产范式

——以晏阳初和费孝通的实践为例

李友梅 耿敬

摘要 20世纪前半叶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是一场社会改造运动，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运动。在这场知识生产运动中，晏阳初的“创造性适应”范式和费孝通的“从实求知”范式，基于自身的文化基础和相异的研究旨趣，提供了诊断和理解中国社会的不同方法和路径，同时也为当时改造中国社会提出了不同的可能性方向。这两种知识生产范式，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遗产，对其实践逻辑的比较分析可以为今天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设带来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 知识生产 晏阳初 费孝通 “创造性适应”范式 “从实求知”范式

作者李友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 200444）；耿敬，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 200444）。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0)06-0005-12

在20世纪前半叶，一场由中国知识分子主导并参与的声势浩大的社会综合改造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大地兴起。对于这场运动，无论当事者将其看成是“今日社会运动的主潮”^①，还是后人将其评价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运动”^②，它都显然不是一场简单的社会实践。事实上，对于投身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而言，这场运动既是他们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进行的一次全方位反思与解构，也是对中国未来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进行的一次多维度探索与尝试，同时更是认识中国社会现实与选择中国发展道路的一场知识生产运动。本文拟辨析“乡村建设”时期晏阳初和费孝通的知识生产路径的异同，探究以文化基础为核心内涵的中国社会学知识生产实践，这些实践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而且促成了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对话和沟通，进而丰富了知识积累，发挥了学术共同体对于社会建构的积极作用和意义。

一、知识生产的文化基础

中国知识传统向来注重以合乎社会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作为评判知识的标准，这也构成了与西方知识体系追求先验或超验的最高知识不同旨趣所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可以视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这一

① 参见许莹澹、李竞西、段继李编述：《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第1辑）》上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5年。

② 于建嵘：《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政治结构的影响——对湖南省衡山县的实证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重要特征的集中体现，他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①这就意味着“知”离不开“行”，“行”亦是“知”的价值实现方式。进而言之，为“乡村建设”付出的努力既体现了参与者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意向旨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同时也是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实践。作为个体学术旨趣的知识生产过程，往往与社会的需求息息相关，社会需求会引导知识群体关注某些特定的领域或特定的问题，运用各自所掌握的理论与方法展开相关研究，并期待所生产出的知识可以支持解决社会问题。这时，知识生产就从一种个体性的思辨或单纯的学术职业逐渐转变成一种社会化的过程与实践活动，学者也逐渐转变成知识分子。

若按照鲍曼的解释：“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对自身的专业或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truth）、判断（judgement）和时代之趣味（taste）等这样一些社会整体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②

我们这里的“知识生产”（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所谈的，正是这类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超越个体情怀、投身现实社会之中的实践过程，它着重关注的是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互动的格局下诸般知识是如何逐步形成的，以及又是如何通过各种载体不断地加以传播，从而成为某种公众知识并影响人们对世界认知的。这种知识生产本身内嵌着一种“真理性宣称”（truth-claim）的特性，知识分子通过不断地将其创造的理论知识加以“真理性”的宣称和传播，甚至还通过某些社会实践去加以验证，并以其生产出来的知识参与到社会新知识的生产过程之中，最终建构形成一套知识体系。其实，在知识体系层累成型的过程中，知识本身的建构性与“暂时性”往往会被受众所忽视，尤其是处于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当生产出来的知识在“真理性宣称”之上又被“科学性”所加持，那么知识受众就自然会弱化对知识本身的进一步反思，这一知识就可以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的“权威”知识，进而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③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道统”求索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真理性宣称”，其所求之“道”皆为“真理”。

费孝通曾在评述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时指出：“研究工作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学术有它发生时的情境及对于生活上的功能。”^④相较于以“学术旨趣”为主导的“个人知识”生产的实践活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实践往往受到“兼济天下”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始终驱使着中国知识分子自主性地参与到知识生产的实践之中。在这一实践活动中，他们是以社会需要与政治理想的实现为使命，学术研究大多偏向现实社会伦理，而且始终为社会现实服务。

20 世纪前半叶，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社会需求。面对鸦片战争以来国家的内忧外患、重重危机，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这时往往就占据“先知”的地位，倡导其理念，投身于社会启蒙。^⑤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虽然百家所持之“道”有不同，但往往都以社会秩序的重建为己任。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如何建构现代国家的问题上，急切地寻找能够做出合理性阐释的理论和知识体系。

在整个“乡村建设”运动中，参与其间的各类团体和机构有 600 多个，分别设立的试验区有 1000 多处，“南北各地乡村运动者，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⑥虽然有着各不相同的理念体系和价值诉求，但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乡村社会，他们依据各自的认识和理解，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改造实验。尽管时间有长有短，范围有大有小，工作有繁有简，动机并不一致，但人们都试图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和角度采取各种可能的途径加以革新或改良，以便探索出一条比较适合中国乡村乃至整个中

① 王阳明：《传习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 年，第 127 页。

② 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 页。

③ 张仲民、章可编：《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2 页。

④ 费孝通：《读曼海姆思想社会学》，《费孝通全集》第 2 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2 页。

⑤ 李友梅等：《社会的生产：1978 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82 页。

⑥ 《梁漱溟全集》第 2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28 页。

国社会发展的出路。

一般而言，知识生产都是在对既有知识模仿或学习的基础上完成的对既有知识的超越，而知识生产者则需要以自身的文化基础为依托加以判断或选择，抛弃怎样的知识陈规，如何汲取他人的知识，如何对不同学科的知识进行重组，进而生产出新的知识以回应特定现实的需要，并尽可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晏阳初和费孝通正是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学术基础，提供了解释中国社会的不同视角与逻辑，把学术知识的追求与国家未来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自觉地投身于关于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中去，进而提出一系列思想理论和实践方案。说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投身其中的乡村建设运动同时也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是因为他们救亡图存的努力皆以“文化自觉”为前提，二者都体现了在古今中西之境遇中对“中国向何处去”的认知探索以及对本土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体认。

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当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的发生完全由于民族自觉及文化自觉的心理所推迫而出。所谓民族自觉就是自力更生的觉悟……沉下来反求诸己，觉得非在自己身上想办法，非靠自己的力量谋生不可。这就是所谓自力更生的觉悟。乡村建设便是这个觉悟的产儿……要谋自力更生必须在农民身上想办法……固有文化已失去其统裁力，而新的生活方式又未能建立起来，因而形成文化的青黄不接，思想上更呈混乱分歧的状态……这种文化失调的现象实有从根本上求创应（creative adaption）的必要。”^①

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即弄明白“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文化自觉”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文化主体性”，即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②

从细微处辨析，晏阳初的文化自觉更侧重于中西对比意义上借助现代西方的他者来映照对中国文化特性的认知，而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更强调了古今传承意义上中国文化传统如何与世界多元文明共存共美的现代意义，广义的“文化自觉”涵盖了以上两个方面。他们在投身乡村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思考不外乎落在两点：社会组织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晏阳初认识到人的现代化的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成为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③晏阳初所指的教育工作是广义的，他注意到了生产教育的重要性，将旨在“增进生产力”的“生计教育”与文艺教育、公民教育、卫生教育共同构成了平民教育的四大类。^④

如果说“人的现代化”是根本问题，而人的生活、吃饭问题便是根本问题中的紧要问题。相较于晏阳初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为寻求民族文化出路而设想的“远景目标”，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则看到了“人的现代化”在当下社会条件下的“分步走”战略，由此我们看到费老“行行重行行”、紧跟“变化着的实际”的阶段思想变化，这些变化与如何从地方性知识逐步延伸到世界秩序与文明进程的总体性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进一步说，在对西方观念的态度上，即便都有西学背景，但比较而言，晏阳初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西方进步观，而费孝通则“按下不表”，“从实求知”，首先要看清乡土社会的本质。这也预示着晏阳初和费孝通在面对中国农民现代化问题时会出现“知识分子的想象”与“农民主体的实践”之间的分离，即便晏阳初坚持以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但先入之见的影响仍难以掩盖。

总体而言，要在实践上解决比较重要的问题就要动用整合性的知识，这也意味着解决问题的实践对整体性、综合性知识提出了高要求。从现实来看，近代中国社会的危机是总体性的，要改变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必然牵涉到方方面面，在这种情境下，如何在向世界敞开大门迎接新文明的同时，不会因外来力量的强大而丢失自身民族和文化的主体性？这是时代之问，也是有着深沉家国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反身自

① 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15页。

② 李友梅：《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③ 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第216页。

④ 参见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问。面对现代文明，他们不是把中国作为封闭的疆域和固化的历史，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民族特性、历史逻辑”^①，以此为基础来“融通”中西古今，并希望通过对自己浸染其中的传统中国文化的“自觉”与“认知”进而能够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主意识和文化适应能力。在现代西方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碰撞之际，他们深刻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自觉和主体性？”^②他们希望以文化知识持有者的身份，为自主性文化的坚守来构建新的知识体系。作为知识分子个体可能会有自身经验和特有专长的优势和局限，但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之间仍可以通过对话、交流，形成更富积淀的知识积累，进而发挥学术共同体对于社会建构的积极作用和意义。

二、晏阳初“国民”性的知识生产

中国近现代知识体系的生产是建立在认识论转向的基础上的。林则徐、魏源的“睁眼看世界”，是中国人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开端，也是中国人的思想认识从传统转向近现代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现代性知识生产的源点。而对“现代人”概念的知识生产影响最大的当数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新民说》提出了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民”理论。^③他认为，国家强弱的基础不在制度、器物而在国民素质，强调国家的现代转换首先是国民德性的现代转换，“新国家”的建立迫切需要具有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新民”。但中国人虽有国家观念却无国民概念，不具备现代国民意识，而“新史学”的任务就是要激发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培养其现代国民意识。其后，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一面将“新民”奉为现代文明社会成员的标准，并不断完善“新民”这种现代人知识内涵，一面又致力于教育实践改造乡村社会进而培育出符合现代社会的“新民”。“除文盲、作新民”正是晏阳初的乡村教育目标。^④

（一）对“新民”的知识生产

在梁启超的“新”化思想中，他根据自己对现代国家的想象，设想出“新民”应有的新德性，诸如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尚武、进取、冒险、权利思想、国家思想、义务思想等。^⑤这种“新民说”对国内青年产生了重大影响，蒋梦麟、胡适、张君勱、蒋百里、丁文江等都深受这一思想极大启示。按照胡适说法，梁启超对“新民”新德性的设计给中国人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诸般美德。^⑥至“五四”前后，陈独秀带着对未来中国的期盼，希望未来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新青年”应具备革新与创造“新民”的精神，为此，他特意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将这种“新民”的特征加以归纳：（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隐退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⑦对于中国人的弱点以及应改革、培养新精神等，都予以指明。相对于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理论家多侧重于人的现代化改造，毛泽东等人更注重针对旧有社会制度的改造，尤其是土地制度的变革。这种认识既符合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均贫富”的利益诉求，也紧扣孔子以来“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梁启超掀起了“新民”思潮，而晏阳初更是把握这一思潮，针对国家的急切与基本需求展开了“除文盲、作新民”的乡村教育运动。

相对于梁启超“新民”的德性之新，晏阳初更侧重于“新民”的人格、生命力之新。“所谓新民的建设是中国全民族新人格的建设。所谓新不是那些不同于我国与我民族旧有的或由东西各国新介绍新抄袭来

① 景天魁：《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9页。

② 李友梅：《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③ 这种“新民”的概念并不全是来自对西方的认识，它也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大学》载有“在新民”，《尚书·汤诰》也有“作新民”之说。

④ 《晏阳初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16页。

⑤ 参见梁启超：《梁启超新民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

⑥ 胡适：《胡适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9页。

⑦ 陈独秀：《敬告青年》，陈寿立编：《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摘编（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1页。

的便是新。我们所谓的新，是我国民族自身在原有的生命里创造出来的新生命的新。”^①从新人格与新生命力的角度，晏阳初为“新民”赋予了不同于梁启超的含义，即智识力、生产力、团结力与强健力。他强调说：“国家不建设在国民的基础上，固然很危险；建设在缺乏智识力、生产力、团结力、强健力的国民基础上更是危乎其危。”所以他强调“新民”必须要具备“民智、民德、民力”三方面的素质。^②

晏阳初的“新民”思想不仅承接来自儒家经典的传统，还要结合西方基督教平等博爱的学说，将“平民”思想融入“新民”的内涵。按他解释：“平民”之“平”，就是基督教的“平等”之义，即“生而平等”。所谓“平”，既是“平等之平，和平之平，平社会之不平的平，要世界各国承认中国人的平等的平……社会上如果一天没有承认平民教育的重要，不把平民教育作为立国的生命，社会就不平一天。非社会平等，人人受教育，世界决不能和平”。^③为此，他还特意将平教会的会徽设计成一个红色的“平”字。

同时，晏阳初发现，梁启超的“新民说”只提出“什么”（What）是应兴应革的，却没有详说“怎样”（How）去实现兴革。梁启超对实现兴革的设想就是通过“新史学”去尝试。而晏阳初及其同仁则是希望通过来自西方的、更为科学的方法去实现。这一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价值偏好，所以“当我们进行创造时，既不盲从地抄袭外人的东西、固执地保守我国的古董，又不偏急地轻视其他各民族的文化贡献，或偏急地抛弃我中国民族固有的一切文化成绩”。“我们也决不假定一个玄想的‘新’来作一切工作的死目标，来范围着我们底思想态度，来限制着我们底工作进行”，而是尽可能以客观的原则加以推进。“我们深信归纳法的科学方法由许多的事实和长久的经验而产生出的结果，比根据假定的原则而强求适合此种原则的事实与经验所产生的结果，要可靠的；所以我们底定县实验里是毫无偏见的。”^④

晏阳初之所以提出“新民”必须具备“民智、民德、民力”等素质，不只是其承继、融合梁启超、基督教思想的结果，他更强调这是来自科学调查的结论。其“新民”知识的生产便增加了一些科学依据，似乎更具说服力。

（二）对“愚民”的知识生产

晏阳初对中国农村，尤其对农民弊端的判断是经历一个从主观认识到科学归纳的过程。1920年晏阳初回国后，结合他在法国华工群体开展“识字教育”的经验，先后在湖南长沙、山东烟台、浙江嘉兴等地兴办平民识字教育，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他这么重视识字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发现了“中国贫苦”、“国人无知识”，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害了三种病，即瞎、聋、哑。国民大部分不识字，不能读书报”同时，“别人还说我们又老”。^⑤由此，他形成了关于中国农村“愚”“贫”“弱”三大弊端的早期思考。1924年，他在《平民教育运动》中又说：“中国人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合作精神。中国被称为‘一盘散沙’！”由此可以看到他后来关于中国农村“私”这第四大弊端的雏形。如果晏阳初关于“新民”的观念多少依托了对西方人美好的想象，那么，他对中国农村各种弊端的判断上，在其主观上也是有意或无意地遵从了西方人对“落后中国”的想象，因而他总是不自觉地运用“别人说”或“被称为”的语词。这时，在他关于中国农村的知识生产中，更多是以西方社会和西方人作为理想的参照物的。在他著名的《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中，更是将中西方直接加以对比来强调中国农村的落后：“试看欧美教育普及的国家，人人有读书看报之能力，两相比较，其智愚的相差，不啻天渊……我同胞弄到三万万以上的文盲……实为中世纪专制国家老愚民。”^⑥可见，在他看来，中国农村以及中国人在“智识”上的“愚昧”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之后，只要有机会，他便利用来宣扬这一主张，以期能引起更多的“有识之士”接受其观点。

① 汤茂如主编：《定县农民教育》，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学校式教育部，1932年，第2页。

② 《晏阳初全集》第1卷，第117页。

③ 《晏阳初全集》第1卷，第528页。

④ 汤茂如主编：《定县农民教育》，第2页。

⑤ 《晏阳初全集》第1卷，第50页。

⑥ 《晏阳初全集》第1卷，第116页。

为了让人们更加相信自己的“愚民”观，晏阳初也强调其对中国农村弊端的判断是具有科学依据的。“平教总会”的生计部主任冯锐曾说，若要真正了解中国农村，最首要的就“在于用科学方法，取我国乡村生活，加以翔实精密之调查与研究，俾全部乡村生活情况，得以整理”。^①正是通过进一步的定县研究，晏阳初他们发现中国农村的弊端就是“愚”“穷”“弱”“私”（即“散”）。^②这就以更为科学的方式再度验证了定县调查前晏阳初对中国社会所做出的判断。因晏阳初对中国农村弊端做出的判断在方法上较他人更为科学，所以其说法影响极为广泛。

关于传统中国的落后和农民的愚昧，当时的知识界有很多分析，但相对而言，晏阳初建构起的知识观的影响力却是最为广泛和深刻的。费孝通《乡土中国》中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分析基本也是对晏阳初观点的回应。费孝通在其《文字下乡》中提到：“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把愚和病贫联接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征候。”“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③从这些回应中我们可以看到费孝通不同于晏阳初的知识生产路径。

三、费孝通对“乡土中国”的知识生产

同样受西方文化教育并尊重现代科学原则的费孝通，虽然也像晏阳初一样注重实地调查，但却没有生产出与晏阳初相似的有关“国民”性的知识，他既未对西方文明的长处和优势作出归纳，以便为我们提供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与落后加以总结，以便唤醒人民的觉醒。自从中国知识界开眼看世界之后，便逐渐默认了一种认知方式，即拿现代西方国家的成功案例做对比，来审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省思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并按照对西方文明的想象在中国掀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其结果“我们只看见要知识分子下乡去的宣传，要改革这样要改革那样的呼声，但是我们绝没有机会听见一个调查农民态度的忠实报告”。判定一项社会运动是否合理或有效，最主要的是看基层民众的认知、反应和接受程度。只有通过本土农民对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认识和态度，“我们才能预测这种乡村运动的前途”。^④如果邹平、定县的乡村工作者“对民众反应和接受程度的关注和了解不够，离开了社会研究和社会知识的支撑，包括乡村建设在内的很多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实验不过是一种‘硬手硬脚的尝试’，虽则打着‘建设’的旗号，其效果却往往适得其反”。^⑤因而，费孝通所看重的并不是空泛的关于中国农民德性的社会知识，而更注重中国农民的生活逻辑及农民生活遭遇的真正问题。

（一）对“乡土社会”知识的生产

费孝通之所以没有像晏阳初等人针对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特性做一个总体性的归纳，是因为他从未将自己放在一个“启蒙者”的位置，并未设想依据自己建构的思想或理论去说服他人，开启民智。其实，他对中国知识界“问题式”的研究方法是有异议的，不管是否真有问题，只要专家按照他的逻辑分门别类地研究就出现了“人口问题”或“家庭问题”等。同时，他对于中国知识界已经习惯了的运用外来理论套用中国社会的倾向也非常排斥。他曾说：“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因为外来书籍文字的输入，以为靠了些国外学者在实地所得的知识，所以用来推想中国的情形。他们其实假定着文化到处都是相同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本身，在我们看来，就是需要加以事实证明的。而且这假定根本就抹煞了加以详细研究的必要。”所以，他“不敢随意接受不是从本土事实中归纳出来的结论”，至于传统的“乡土中国”的事实到底如何，那还须“先得在实地详细看一下”。^⑥

① 转自 Ray Lyman Wilbur: *The Memoirs of Ray Lyman Wilbu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Xi.

② 《晏阳初全集》第 1 卷，第 433—434 页。

③ 《费孝通全集》第 6 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13、119 页。

④ 《费孝通全集》第 1 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31 页。

⑤ 《费孝通全集》第 1 卷，第 257—258 页。

⑥ 《费孝通文集》第 1 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年，第 405 页。

1936年，通过花蓝瑶社会的实地考察，费孝通认识到，“乡土中国”的“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具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的价值，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所以，任何针对“乡土中国”的批判甚或改造，都“不能不先清理这个网络，认识它们所有相对的功能，然后才能拾得好处”。而晏阳初、梁漱溟等所推进的乡建运动，“老实说，是在拆搭配。旧有的搭配因处境的变迁固然要拆解重搭，但是拆的目的是在重搭，拆了要搭得拢才对。拆时自然该看一看所拆的件头在整个机构中有什么功能，拆了有什么可以配得上”。^①这是费孝通比较明确地提出“乡土中国”具有的系统性特征。

而《江村经济》一书是费孝通对这一系统比较全面的分析。在这本书中，他试图“在乡村生活、农村经济、农村人口的利益和需要中”找到“农村文化的基础”。^②通过对江村实地考察，他给我们介绍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展示了家庭婚姻、社区组织、生产分工、消费交易以及土地分配等各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考察了这一乡村社会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关注当时现代西方文化对这一乡村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从其细致入微的实地调查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乡村社会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那种“微妙的搭配”，也可以了解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件头”所具有的功能。

费孝通对“乡土中国”知识另一次生产活动反映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本书对于“乡土中国”的知识生产首先是贡献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关于“乡土中国”知识的概念表达，如“差序格局”“无为政治”“长老统治”“横暴权力”“社会圈子”“礼治秩序”等。这些概念也反映了乡土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另外，在这本书中，费孝通对晏阳初所建构的“国民”性知识提出了质疑，他每每以“乡村工作的朋友认为如何，实则情况怎样”的句式下笔，尤其是对农民愚贫弱私的观点更是予以直截了当的批评。费孝通认为，乡村工作者们依据自己的想象赋予农民以愚贫弱私的德性，并进而想当然地要通过“文字下乡”的方式展开乡村教育，以图“启蒙”民众成“新民”。费孝通指出，正是没有抓住“乡土中国”问题的根结所在，没有掌握农民的真正需求，所以其乡村教育也难以符合农民的胃口。此外，在费孝通众多文章中时常提到的“知足常乐”“安土重迁”“小农经营”“合作互助”等概念，都是关于“乡土中国”生活逻辑的描述。

其实，费孝通对乡建运动中那些“乡村工作者”改造社会的情怀与努力是赞成的，他反对的是那种没有认清真正的社会弊端之前就盲目进行改造建设的做法。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社会如何建设与发展的问題，首先就要弄清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这也是他关于“乡土中国”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在江村的实地调查，他认识到：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③根据他的分析，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了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④正是这种传统手工业“在传统经济中富于自给性的农村是个自足的单位”，有了这些手工业才能让农民有点“活钱”来缴纳租税以及零星消费。然而，随着西方现代工商业的冲击，“农村手工业崩溃中打破了，农村金融的竭蹶跟着就到了”^⑤，农民便“站在饥饿边缘上”了。

费孝通这些关于“乡土中国”的知识生产并非来自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也非出于“启蒙”而对中国社会传统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而是源于扎实的“实地研究”上。

（二）对“乡土工业”知识的生产

在费孝通看来，当今中国在面对“已经成熟的西洋侵略性的工业经济”时，若“要确立我们民族工业的阵地，在策略上大概不能避免走上复兴乡土性工业的路子”。^⑥当时中国知识界主张走西方工业化道路的大有人在，并且大多数是主张要仿效西方先进国家，在都市中建设现代化的大工业或重工业，通过发展

① 费孝通：《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费孝通全集》第1卷，第431页。

② 《费孝通文集》第2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17页。

③ 《费孝通文集》第2卷，第199页。

④ 《费孝通文集》第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68页。

⑤ 《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192—193页。

⑥ 《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371页。

工业来带动乡村。那么，费孝通又是如何阐述他的“乡土工业”的呢？

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的复兴与发展按照什么路径走，是需要明确一个根本纲领的。这个纲领就是要首先解决农民的饥饿问题，“保证每个人能得到不饥不寒的水准”。^①在他的思考里，任何现代工业建设的出发点并不仅仅是“为了工业着想”，而是要“为了这三万万几千万的农民着想”。^②之所以在选择走哪条工业发展道路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发展“乡土工业”的道路，正是希望重建被西洋工业打击的乡土工业继续作为中国乡村的重要组成，阻止中国乡村逐渐单纯农业化（去工业化）的进程，延续“农工混合”的经济方式，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费孝通对现代乡土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作了明确区分。他认为：“乡土工业可以是手工的，也可以是机器的；可以是家庭性的，也可以是工厂性的。重要的是在这种工业并不隔离于乡村，在原料、劳工、资本等各方面以乡村的来源为主。”传统手工业向乡土性的现代工业转变最主要的是将现代机器、动力引入乡土工业。即便转化了的乡土工业未能完全变质，未能彻底成为现代工业，但也不再是传统手工业了。正是为了避免与传统手工业产生混淆，费孝通才特意采用了“乡土工业”的概念。^③在他看来，传统手工业是否能彻底转变成现代工业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可以复活的乡土工业能够“增加乡民的收入，增加一点是一点，愈多愈好，愈快愈好”，如果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有多少可用的机器就用多少，有多少可以引入的现代知识就引进多少”。^④只要能使乡土性的现代工业在中国农村发展复兴起来。

他所说“乡土工业”的基本特征大致是：“（一）一个农家可以不必放弃他们的农业而参加工业，（二）所以地点是分散在乡村里或乡村附近，（三）这种工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参加这工业的农民的，所以应当是合作性质的，（四）这种工业的原料主要是由农民自己可以供给的，（五）最主要的是这工业所得到的收益是能最广泛地分配给农民。”^⑤基于这种认识，他所提倡的发展“乡土工业”并不是主张“一切工业都分散到乡村中去”，也不强调非是手工业生产，其他适合在乡村生产的工业都可以，这种工厂并不全属于家庭工业，有些也可以设置在乡村其他地区或附近。对于这种传统手工业是否能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他认为，随着新动力（尤其是电力）的出现，以及卡车、公路、电话、航邮等新技术的进步，“分散工业不成为幻想了”，关键是工业区位组织是否合理。

费孝通之所以反对中国现代化走单一化的大工业道路，主要是担心新动力、新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机会被某些“豪门”独占，而不能惠及更广大的农民，因此他认为我们“不应该走上西洋资本主义的路上去发展我们新工业”^⑥，而是极力主张多元化地发展工业。既要发展高度机械化的大工业，也要引导和扶植乡土性的现代工业的发展。单纯要求发展高度机械化的大工业来带动中国乡村，其实是不完全切合实际的。所以，费孝通更强调“要乡土在自力更新的原则中重建起来”，那“乡土工业”无疑是一种最有效的选择。从实质上说，这种“乡土工业不过是一种中国工业化的过渡步骤”，其对中国高度工业化的发展并不会有所阻碍。^⑦

费孝通这些对于“乡土工业”的知识生产“并不是毫无事实根据的”^⑧，是来自对费达生在江苏农村 20 多年乡村建设实践的总结。^⑨正是由于这项实践取得了一些“成绩”并为农民所接受，农民也自愿加入合作组织。农民的回应和选择是费孝通肯定“乡土工业”发展并进而建构“乡土工业”知识的坚实基础。

①《费孝通文集》第 4 卷，第 408 页。

②《费孝通文集》第 4 卷，第 383 页。

③《费孝通文集》第 4 卷，第 437 页。

④《费孝通文集》第 4 卷，第 437—438 页。

⑤《费孝通文集》第 4 卷，第 384—385 页。

⑥《费孝通文集》第 4 卷，第 388 页。

⑦《费孝通文集》第 4 卷，第 439 页。

⑧《费孝通文集》第 4 卷，第 185 页。

⑨ 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是“我国乡村制丝工业的首创者”，她主持和参与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苏女子蚕校和开弦弓村的蚕丝业改革。参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纂：《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程技术编·纺织卷 1），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6 年，第 271—282 页。

四、知识生产的实践逻辑

综上所述，晏阳初的知识生产是基于其乡村教育的实践，费孝通的知识生产则源于其实地观察和其对费达生乡村建设实践的总结。二者着眼点不同，看到的问题不同，提出的应对亦不同。这种不同皆出于二者基于自身文化基础之上的研究视角和实践逻辑的差异。

（一）晏阳初的“他者”视角

晏阳初提出了“创应”（creative adaption）即“创造性适应”的概念，其含义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创造性适应”平民的需求和生活方式，在适应中改变他们；另一方面是由此促进平民“创造性适应”现代生活。^①如果将晏阳初的“国民”性知识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它深受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同样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梁启超阶段的中国知识群体多采取“全面学习西方”的态度，而对中国的“国民”性却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沉浸于单纯的反思和批判之中，而对如何改变往往采取人文主义的或想当然的方式，按照梁启超的原则是“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励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辅其所无而新之”。^②但对于如何“淬励”与“采辅”，却并不明晰，能想到的还是其所擅长的教化方式，运用“新史学”开启民智。

而晏阳初则相对比较冷静，至少在接受西方的思潮和观念之外，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他也希望自己尽可能地采用西方科学化原则或方式。在分析中国的“国民”性时，虽然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教义观念的影响，但他始终强调西方先进的科学原则与理性的态度。与同时代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一样，晏阳初也“带着西方的习惯、实践以及看待生活的方式回国，以至于发现自己的出生地比西方更加异己、生活方式更加陌生”^③，不免产生比较强烈的异化感。当他对中国农民做出“愚、穷、弱、私”的“问题”诊断时，更容易采取一种“他者化”（othering）的研究视角回首检视中国社会生活的方式，运用西方（“他者”）的标准来框定中国社会，从而慨叹两者“天渊”般的差距。这种与本土生活之间的异化感时常在其乡村教育的文章中出现，相较于近乎完美的“他者”（“新民”），中国农民更是可悲可怜的“愚民”。用他晚年的话说，西方的社会文化确实“令我钦佩感动”，而反观中国的社会文化，“我又觉得惭愧”。^④带着这种异化感，让他无形中便增强了削足适履的内在冲动，也更易产生对中国本土“国民”性的想象，进而放大了对中西“国民”性差异的敏感性。虽然如此，但在定县实验的“加持”下，很容易被具有“知行合一”理念的中国人所接受。

对西方文化的推崇，也使得他在思考如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时，尽量避免梁启超等人的人文主义方式，而是运用客观理性的西方科学工具，更注重具有实效性的方法。在杜威的教育思想备受推崇的时代，其实用主义、平民主义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杜威认为教育应以社会生活为内容，教育是以培养发达的个性人格为目标的。^⑤因而，针对平民的教育实践也自然而然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工具。相对于西方教育家“教育是为适应生活”（Education for life）的主张，晏阳初更强调教育“改造生活”（Education is re-build life）的意义。他希望通过乡村教育改变“脏的、穷的、臭的、散漫的”中国农民，改造“不科学”“不合作不卫生”的中国社会。^⑥所以，在他指导下的“平教总会”进行定县实验时，强调“一切以社会调查作指南针，故凡事都有根据”，对于收集到的“土产土法”，应用现代农业科学加以改进，并注意这样改进是农民心理上、经济能力上可以接受并担负的”。他们自己也认为，这种以西方科学为准则，努力融合中西的做法，“比较梁启超《新民说》更有具体内容与方法”，对于“什么”是应革应兴的，和“怎样”去兴革，都是根据对乡民生活的实际调查和具体实验作出判断的，而“不是闭门造车

① 肖琰：《从创造性适应到创造性转化：社会学的中国主体追求》，《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3期。

② 参见梁启超：《梁启超新民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

③ P. Padhye,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Asia," in *The Intellectuals*, ed. by G. B de Huszar,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60, pp. 432-435.

④ 《晏阳初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28页。

⑤ 约翰·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常道直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

⑥ 《晏阳初全集》第1卷，第432页。

或纸面文章的想象”。^①由此可见，“他者化”的科学视角是晏阳初“国民”性知识生产的实践逻辑。

(二) 费孝通的“主体”视角

对于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乡村民众来说，也处于“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②的境地，因而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多将这群中国民众看成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甚至是没有智力表达自己的人，所以需要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一方面运用更为“先进”的思想理论加以启蒙和引导，促使他们觉悟起来，另一方面作为普罗大众的代言人、从民本主义出发大声地代民众发声。在这一过程中，那些作为社会主体的民众始终被表述为“他者”，也一直没有真正出场。费孝通与同时代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他不是普罗大众的代言人，并不是站在西方文明社会的角度理所当然地提出普通大众的现代需要，而是“到实地去”寻访和发现他们的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早在 1936 年赴英留学前，费孝通受吴文藻、派克、史国禄的影响，逐渐接受了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基本观念，注重文化系统的平衡，认为要理解社会的变化，就要把观察的重点放在构成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平衡上。正是通过践行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方法，费孝通在江南和西南村庄的考察中，敏锐地发现，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中国乡村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手工业，正是手工业作为农业经济最重要的组成，中国传统的农村经济才能持久、平衡地维持着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当西洋工业摧毁传统乡村工业之后，中国乡村原有经济系统的平衡被彻底打破，对于土地紧张的中国农民而言，面临着的最大危机和问题就是饥饿。此时，那些被知识分子们认为没有立场、不会发声的农民，便以行动作出了选择。他们所能做的，就是重新恢复失衡的经济系统，努力调整传统的手工业使其转变成现代工业。费达生等知识分子的技术指导，地方精英的有力倡导，农民的积极参加合作社的态度，几方面的共同努力使得农民看到了现代工业在乡村重新复兴的希望。这一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过程，也是一个失衡的社会经济系统重组的过程。

费孝通正是亲眼看到了农民们的选择，了解到农民面对西方工业冲击所做出的回应，看到这种回应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希望，同时，他也认为，这种选择一方面可以减轻乡村建设所产生的巨大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减缓高度机械化大工业发展所造成的农村衰落。

同样接受西方教育，认同西方的科学理念，为什么费孝通会采用完全不同于晏阳初的视角，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根结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呢？费孝通后来把他研究的原则总结为“从实求知”。^③他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教育”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任何一种客观的事实，一定存在于整体之中，而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把事实置放在一个有机的整体内，把它置于那些解释生活现实的系统中去”。^④而这些客观事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作为一个大的文化系统的要素彼此关联的，并分别承担着一定的功能。中国乡村社会的失衡，就是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的某一组成部分出现了问题，丧失了其原来所承担的功能。所以，要想找到中国乡村社会真正的问题根结，就必须深入实地去考察探究，即“从实际生活出发去理解实际生活”^⑤，具体而言，就是采用系统化的实地调查方法去获取最为“真实”的一手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加工成民族志文本，然后再从这一文本中反映出所思考的问题和规律。这就是一个“求实”的过程。

正是遵循这种“从实求知”的原则，费孝通没有站在“启蒙者”的立场去极力说服民众，也没有将自己当成普罗大众的代言人。他只是在实地调查中，看到了农民通过实践作出了选择，已经用行动作出了具体的榜样。同时，他个人也通过学术实践潜移默化地从思想感情上逐渐浸染进去^⑥，并以农民的视角，为

① 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637页。

②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8页。

③ 费孝通：《我看人看我》，《读书》1983年第3期。

④ 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41页。

⑤ 费孝通：《从实际生活出发去理解实际生活——在上海大学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的讲话》，《上海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⑥ 参见费孝通：《留英记》，《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大众立言。更重要的是，费孝通的“从实求知”原则是在不断地把握变动的“实际”中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在全球化深化的背景下提升“文化自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真问题，而“真问题的发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获取，又需要根据‘实’的动态发展与多层次特质而不断调整和修正”。^①

费孝通对文化主体性的注重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方面，他特别注重中国乡土社会变迁中农民的“主动精神”，他将都市和乡村间的流动人口比作“乡村社会变迁的种子”^②，看到了“种子”的生命活力和生发作用；费孝通在谈到民族自立的主动性时指出“首先还是要培育内在活力”^③，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费孝通在知识生产中把实践参与者作为社会变革真正“主体”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他已经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深层次上与现代化的不适应性，因而强调中国的文明和文化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通过主动学习而非被动甩开从而赢得主动性，尤其在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中遭遇了新旧体制之间的嫁接问题时，他指出“新体制要实际地考虑以什么方式解决毛将焉附的问题”^④，如何唤起农民的主动精神，渴望“土”能化“洋”，把“旧皮”加到“新皮”上再生产出一种新皮来，这体现了一种期待着传统文化在中西相遇时能够从“创造性适应”走向“创造性转化”的努力。

五、一点启示

晏阳初与费孝通的知识生产实践虽然走了不尽相同的途径，但其知识生产的“实践性”确也引发了之后中国社会学学术风气的“实践性转向”，从此之后“到实地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基本要求。晏阳初与费孝通所建构的理论知识，在“真理性宣称”之外又进行了“科学性”的加持，即需要通过相应的社会实践予以验证。虽然二者对社会生活领域的理解存在差异，进而体现在对实践本质与目的的理解上也产生不同，但二者的共同性就是对“实践性”认识的高度一致。正如鲍曼所说的，“在传统之外，在‘地方性’之外，不存在衡量特殊性实践的标准”，所以“对于各种知识体系的评判，也只能来自各种传统之‘内部’”。因而无论西方文化基础上的知识还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只有通过“使其生效的实践”加以检验，这知识体系“才是有意义的”。^⑤虽然二者的实践路径各异，但对认识中国社会现实应是互可参阅、碧玺映照的。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性”应当成为今后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

从知识生产的视角，我们发现：晏阳初是站在知识立法者与阐释者双重角色的角度实践其知识生产的，而费孝通则是站在单一的阐释者角度实践其知识生产的。“立法者角色由对权威性话语的建构活动构成……他们的知识，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完善有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关系……阐释性角色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由某种共同性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这一策略并非是为了选择最佳社会秩序，而是为了促成自主性的（独立自主的）共同参与者之间的交往。”^⑥晏阳初之所以将中国农民“他者化”，并将农民建构出“新民”之外的贫民他者，一方面他作为西方文化知识的阐释者，另一方面他又扮演着中国社会新知识的立法者。而费孝通之所以“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其知识生产正是扮演着中国农民生活现实的阐释者。他没有“先知”的觉悟和意识，而更看重农民通过生活智慧闯出的道路，他的知识生产只是对农民智慧的再阐释。如今，在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建设中，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问题将是值得思考的。这“意味着知识分子更多地从理论的建构走向生产的实践，从而为社会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量”。^⑦由此，晏阳初和费孝通的知识生产走向各自不同的实践范式。

① 李友梅：《“从实求知”与作为研究范式的“江村学”》，《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② 费孝通：《社会变迁研究中的都市和乡村》，《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115页。

③ 费孝通、鹤见和子等：《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中日学者共同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页。

④ 费孝通：《再话浦东》，《费孝通文集》第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

⑤ 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⑥ 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第5-6页。

⑦ 李友梅等：《社会的生产：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第91页。

其中,晏阳初的知识生产实践更注重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强调知识分子在这一现代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他先以“阐释者”的身份描述了现代社会成员“新民”的形象,同时也指出了“贫民”适应现代社会的标准,接着又以“立法者”的身份为“贫民”构建了一条进入现代社会的路径——即乡村教育。他认为,只有通过乡村教育,才能弥补“贫民”认知上的缺陷和能力上的不足,以便达到“‘人’及其生活基础”的改造和自我改造^①,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以适应并符合西方主导的现代社会生活。这算是一种“创造性适应”的知识生产范式。费孝通的知识生产实践则是依托于农民的自主性的创造,更注重观察农民是如何应对西方工业冲击的。虽然他与吴景超一样,都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道路,但对于如何实现中国工业化,他更想观察农民是如何作出策略性选择的。而来自社会底层农民的探索性实践,可能更符合实际,更有生命力,当然也更具有主动精神。费孝通不仅注重像费达生那样的知识分子在乡村实践的经验,更注重农民本身的实践考虑。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实践探索出的“乡土工业”,不仅是中国工业化的一种过渡步骤,同时也是一种主动性的转化,是农民自己寻找到的进入现代社会的路径。这种从具体社会实际的实践中求得知识的路径,可以归纳为“从实求知”的知识生产范式。

晏阳初“创造性适应”的知识生产范式与费孝通“从实求知”的知识生产范式,分别代表着两类不同学术取向的知识群体:一是更侧重外在的客观标准,一是更注重内在的主体能动。如今中国社会学界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不同的文化基础和学术背景深刻影响着人们认识社会和解释世界的不同方法,然而,任何一种认知或解释都丰富了我们对社会与世界的理解。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虽然晏阳初与费孝通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方法有所不同,但其知识生产实践的最终目标却是一致的,即“改变世界”,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

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又处在一个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同样迫切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及社会学界,面对改革开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做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解释。这就需要中国社会学界以革新的勇气,开创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学知识体系。晏阳初与费孝通知识生产的范式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传统一直影响至今,因此,在建构中国社会学新的知识体系之际,回顾和反思晏阳初、费孝通的学术遗产,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研究”(17ZDA112)、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委托课题“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构建若干问题研究”(2019WHB00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胜强)

The Paradigm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Chinese Sociology

——Take the Practice of Yan Yangchu and Fei Xiaotong as Examples

LI Youmei, GENG Jing

Abstract: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s not only a movement for reconstructing society, but also a movement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In this movement, the paradigms of Yan Yangchu's "creative adaptation" and Fei Xiaotong's "seeking knowledge from reality" are both based on self cultural foundation and different interest in their research, supporting different ways of asserting and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ciety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posing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for the dimensions of reconstructing Chinese society. As the academic heritage of Chinese sociology, these two paradigm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provide important revelation for today's construction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ociology by their praxis logic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Key words: knowledge production, Yan Yangchu, Fei Xiaotong, paradigm of "creative adaptation", paradigm of "seeking knowledge from reality"

①《晏阳初全集》第1卷,第56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